

九龍衙前圍村吳氏祖先的追尋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一) 引言

衙前圍是九龍的古老村落，筆者首次踏足這條村落並進行研究是在2000年，當時的衙前圍村雖已面對大地產商的收購和拆卸的危機，但圍內的結構仍然清晰可見，它的主門設於東面，上書「慶有餘」，全村呈長方形，有明顯的中軸線：盡頭是供奉天后的神廳，在中軸線的兩邊，各有六條橫巷，左右對稱，屋宇整齊排列其間。各屋規格相等，約十呎乘二十呎，村民稱為「一分地」。雖然村民習慣認為衙前圍是由吳、陳、李三姓人組成的雜姓村落。不過，隨著吳氏的發展，在2000年，大部份村內房屋的業權已是由吳氏擁有。

目前衙前圍村分作四房，是以廣東十一世的祖先吳廣玄、吳東玄、吳泰玄和吳日玄作為代表。四房之中，以第四房日玄祖的人丁最旺、財力最大，所以到十九世時，日玄祖的子孫再分四房，分別為德高祖（四房一）、俸高祖（四房二）、翰高祖（四房三）和仕高祖（四房四）。一直以來，日玄祖各支均積極編修族譜，目前找到的族譜，如民國7年（1918）的《吳氏重修族譜》與民國26年（1937）的《吳氏家乘》同樣是四房四支譜，二者內容大體一致，只是《吳氏重修族譜》記至廿二世，而《吳氏家乘》則記至廿五世而已。另外廿五世孫吳揚森先生收藏的《吳家族譜》也是四房四的記錄，但比較簡略，也缺年份，相信是他個人從上述族譜節錄出來。廿六世孫吳世明也收藏了一部他自己本房的族譜，但缺年份和名稱，從內容考察，這是屬於四房一的支譜。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衙前圍村吳氏，要到1986年才編修出一部代表四大房（廣玄、東玄、泰玄和日玄）的族譜，亦即是目前所見的排印本《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即是如此，四房四在這一部族譜中仍有著超然的地位，除了來自該

房的廿五世孫吳詠棠（或吳文川）親自作序外，族譜的開首更放置了四房四始祖吳仕高及其子吳臣任的夫妻畫像。¹

本文的目的是敘述衙前圍吳氏對其祖先理解是一個不斷轉變的過程，在以下的部份，我們將可發現吳氏族譜中有關其祖先事蹟的敘述，與近年村民自己所講的大相徑庭。這個轉變，反映了宗族在不同時代的需要；而考察的過程，則有助於我們對華南宗族的了解和九龍早期地方歷史的認知。研究材料方面，除了以上的族譜資料外，還依賴大量經筆者和其他學者所做的訪問記錄。

(二) 典型的珠三角宗族故事

吳氏擁有華南地區大部份宗族的特徵，包括有一個極為顯赫的貴族遠祖。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吳氏的始祖是周太王的長子泰伯，泰伯雖為長子，但寧願將天下三讓與三弟季歷，自己舉族南遷，由陝西岐山避居至當時仍屬於荆蠻之地的江南無錫。在泰伯之後，到春秋時期，吳氏又再出現與泰伯具有同樣賢德和貴族身份祖先延陵季子，該族譜記載：「諱夢公生四子：長諸樊公、次餘祭公、三餘昧公、四季札。札賢而義，曰不可遜讓，長而嗣之，以此封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屬浙江之地，今名常州是也，後子孫皆以是稱。」可見無論泰伯或延陵季子這些吳氏祖先，均是不戀棧帝位的賢者。吳氏將自己的遠祖上結至遠古的名門望族，無非是要說明自己的祖先是來自有高度文化的中原正統，而非被稱為「南蠻」的廣東土著可比。除此之外，吳氏也憑著其祖先的貴族背景，得以「合法地」建立起本族的祠堂。²目前所見，衙前圍吳氏宗祠建於圍村的右側，門前對聯是「箕裘綿世澤；支派享延陵」，而祠內的「至德堂」壇上，所置放的木主也被書上「延陵堂上歷代祖先考妣

之神位」。村民告知筆者，「延陵」是古代高尚的名銜，他們的祖先得這個名銜，遂傳之後代云云。³

衙前圍吳氏既將祖先的淵源定在中原，使到宗族的日後發展便必須有一段「南遷」粵東的插曲。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記載，南來廣東的始祖為吳氏七世祖吳居厚（1078-1158），關於他的生平，族譜有如此的記載：

公初遷豫章洲東湖，字敦老，號重本，長子鼎。公在宋徽宗時，初為武安二節度推官，後舉提河北建閣，歷官至樞密院事。徽宗王尊崇佛法，屢諫致怨，父子失儀，火燒而罷。退回家後，胡虜邊犯南侵。徽宗俾攜北去，至于靖康元年大亂，四方鼎沸，民不安席，後厚公攜家眷至南雄府舉兵救主，弗期，軍兵預知調用，就被南雄下屯集民兵五千餘眾。不料天不從人，公生七子，守制不能操駕，人心澆薄，不可勝數，遷於合同場暫住，將父所遺產物，議七子均派，各擇處安身，散處各地，買業開基。

族譜這部份的記載，存在許多難以理解的部份，例如當徽宗被擄，為甚麼身在河南的吳居厚要千里迢迢來到廣東招募義兵？又例如靖康之難是發生在靖康元年（1126），但吳居厚死亡的年份是在1158年，亦即是南宋紹興二十八年，是否意味吳居厚用了32年的時間在南雄組織義兵，卻一直沒有作戰？⁴這些漏洞與矛盾，顯示了族譜編修者在「追憶」祖先過程中的大意。不過，撇開這些漏洞和矛盾，族譜卻清楚地解釋了吳居厚南來廣東的原因。他的南遷，是為著到廣東招兵以營救宋徽宗，只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而既然大事沒成，他的七個兒子，也就索性在各地置業開基。

南遷廣東，下一步當然是定居九龍。這個過程，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記載，吳氏一共經歷了八代，居厚之後，五子吳最成為吳氏南

來廣東的二世祖，他卜居東莞縣吳家涌；吳最生二子，長子念二亡失，次子念五，成為三世祖；念五生將士（四世祖），將士生七五（五世祖），七五生三樂（六世祖），三樂生六萬六（七世祖），六萬六生從德（八世祖），從德生成達（九世祖），而成達就是衙前圍吳氏的開基祖。目前衙前圍村的廣玄祖、東玄祖、泰玄祖和日玄祖四房祖先，就是吳成達的四位孫子。前述的吳氏宗祠，就是以吳成達祖的名稱登記，而由這四房各選一名司理共同管理。

雖然吳成達具有這樣的重要性，吳氏族譜中對這位衙前圍的「開基祖」卻記錄不多，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吳氏本居於東莞，到吳成達這一代，他攜帶著父親吳從德和「先公骸骨」，「過江」遷居至新安縣的官富司及衙前圍等處。族譜中有關吳成達的資料非常少，甚至連他的生卒年份也欠奉。

從一些蛛絲馬跡看來，村民曾相信他們的祖先是在元末明初才於衙前圍定居下來的。在1976年，村民在圍內天后宮內豎立「廟史」碑刻，上載：「歷史悠久之慶有餘衙前圍村，本建業於元末明初年間，是為公元1352年，距今六百二十餘年矣。」⁵1982年，衙前圍鄉長李富在一篇介紹其圍村的歷史中則表示，吳、陳、李三姓祖先真正遷入衙前圍居住是在明朝初年，他說：「明初洪武三年至建文二年（1370-1400）本圍原居民始祖陳朝賢祖、李成規祖、吳成達祖族人自東莞遷來官富場（九龍城）、……起初居於九龍城侯王廟何家園附近，上名為荔枝園。當時因地處偏僻，常受流寇劫掠，居住不寧，於是在明永樂年間（1410-1424）遷居至衙前圍現址。」⁶李富是李成規祖的後裔，而據他的說法，吳成達便顯然是明朝初年15世紀時候的人了。

簡單來說，吳氏的族譜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族的故事：先是在宋代由地處粵北的南雄遷到三角洲，然後經過數次遷居，大致在明代初年定居下來。顯然，吳氏的祖先包括泰伯、延陵季子、吳居厚、吳日玄、吳成達等數十代的祖先事蹟，均不是信史的記錄，而是許多代之後衙前圍的吳氏定居者在追尋遠祖過程中的

認知，所以內容固然有不少推斷，漏洞和矛盾也是難免發生。故此，我們應有的問題不是這些遠祖是否真實可靠，而是這些遠祖及其事蹟是在一個怎樣的歷史環境下追尋出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則往往關連著一個宗族的根基。

(三) 宗族的開始

根據天后宮內的「廟史」碑刻，吳氏自明朝初年開始，一直在九龍地區輾轉流徙，直至清初雍正年間，才正式連同吳、陳兩姓建園定居。碑文說：

……蓋明初時胡虜南侵，海盜猖獗，民因避亂，輾轉遷徙，迨至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始得安居樂業，聚吳陳李三族姓氏建村開井而居，雖世變滄桑：而遺跡尚存，園內之天后宮歷史久遠，村民仍皆奉祀天后元君，七約鄉民為崇德報功，例定十年一屆太平清醮，藉以酬謝神恩，第一屆創於雍正丙午四年（公元一七二六）時至丙辰（公元一九七六）已第廿六屆……。⁷

這碑刻顯示衙前圍的建築時間是在1724年，而且在建園的兩年後，衙前圍村的雜姓居民即聯合附近其它村落進行首次的太平清醮活動。

雖然吳氏在九龍居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並於雍正二年建園定居，但並不意味著宗族的建立。宗族的建立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它是一系列儀式性和制度性建設的結果，諸如設立祖嘗、修建祠堂和編修族譜等等。⁸ 據《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在清嘉慶八年（1803），二十世祖吳臣任（1751-1823）重修其九代之前的祖先吳日玄（十一世）位於九龍元嶺村附近的墳墓。吳臣任這個行動，意味在嘉慶初年居住在衙前圍的部份吳氏，正嘗試建立一個以日玄祖為祭祀中心的宗族組織。吳臣任也有可能曾編修族譜，因為當這房的子孫在1918年重修吳氏族譜（即《吳氏重修族譜》）的時候，曾表明他們是根據「舊本」編輯而成的。

即使吳臣任於嘉慶年間曾編修族譜，那次的編修工作也相當粗疏，所以在1918年當日玄祖的子孫根據「舊本」修撰《吳氏重修族譜》的時候，便立即發現「舊本」的世系存在一個嚴重漏洞——即在十一世祖日玄祖之後，便立即記錄十六世的朝鳳、存鳳、遠鳳、廷鳳和美鳳，缺載了十二至十五世的祖先。當時就著這個問題，編修者曾造訪耆老，最後也沒有肯定的答案，只能懷疑是「清初海氛未靖，遷民以避，輾轉流亡，慘不忍述。迨康熙初年，准還原鄉，因而遺失數代，無從稽考。」但是這個說法，對於廿四世孫吳煥琪來說，仍然有問題。他在1937年編撰《吳氏家乘》的時候提出了疑問，指出既然說是遺失了四代資料，那麼為何《吳氏重修族譜》所根據的原譜又以朝鳳是日玄祖長子，存鳳是日玄祖次子，遠鳳是日玄祖三子，廷鳳是日玄祖四子，而美鳳是日玄祖五子？何謂遺失四代？面對自己提出的疑問，吳煥琪稱自己也「未敢臆測」，所以在《吳氏家乘》的有關記載上仍是原文照錄。1986年，衙前圍的吳氏又再重修族譜，這一次是要編寫一部代表四大房的《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在這個時期，作為編修者的廿五世孫吳詠棠再度將這問題提出來考證一番。他認為清初遷界，初遷起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復界止於康熙七年（1668），前後只有7年，不可能因而有數代之遺失。再在假設吳成達是明初時候或稍前時候人下來計算，遺失數代之事應發生在明中葉的倭寇期間。⁹ 似乎由於初修族譜時的過於大膽假設，加上日後吳氏子孫的過於小心求證，吳氏雖然經過一百多年的重覆考證，即使在1986年的族譜中，仍然不能補回十二至十五代的祖先。

吳氏宗族的更大發展應是在清末。光緒二十年（1894），衙前圍吳氏建立起祠堂，這對於聯繫鄉親情誼，起了很大的作用。《吳氏家乘》（1937）作出了讚嘆式的描述：「在衙前圍之西方營建祠宇數楹，崇祀先靈，規模雖少，聊伸追遠之忱，老幼聯歡，共聚鄉親之誼。」這個吳氏宗祠原本位於東頭村北東隆道旁，因1962年政府徵地的關係被迫遷徙至現時圍村的旁邊。重遷祠堂，固然牽涉一些改變，例如建築物的結構由兩

進改爲單進，不過據衙前圍村上生上長的村民吳佛全先生（71歲）告知，無論新舊吳氏宗祠，在管理上一直是由吳成達祖以下的四房司理共同負責。

至此，我們大概可以進行一個初步的結論或者假設：到19世紀後期，居住在衙前圍村的日玄祖後裔，與其他吳氏組織起來。他們以吳廣玄、吳東玄、吳泰玄和吳日玄四位同代的祖先作爲血緣的紐帶，而宗族的祭祀中心則定在這四位祖先的祖父吳成達祖，並以吳成達作爲整個衙前圍吳氏宗族的控產名稱。不過，因爲吳成達缺乏顯赫的功名，修建祠堂便缺少了一份合法性，這使得吳氏有需要將祖先上溯至古代的延陵季子，使到無論吳成達或其他吳氏子孫，均繼承了貴族的身分，於是建祠祭祖便完全符合清朝的法律了。而經過這一個改變，吳氏不單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宗族，同時也出現了四房。1918年編修的《吳氏重修族譜》，雖是日玄祖的支譜，但也是順應這個演變而編成的。

(四) 宋帝昺傳說的加插

筆者是在2000年開始在衙前圍村進行口述歷史的搜集，不過在進行實地調查時，從吳九鄉長口中聽到的竟是一個有異於吳氏族譜的「開基」故事——一個與宋帝昺有關的傳說。他指出，衙前圍村吳、陳、李三姓祖先，其實是13世紀初逃難到南方的南宋小皇帝宋帝昺的大將。當時，吳、陳、李三位大將，合力護送這小皇帝南下九龍，於是在現時的衙前圍村定居下來。故事不止於此，在往後的日子，吳九鄉長仍一直致力加深衙前圍村和宋帝昺的關係，例如在2003年，面對新聞媒介，吳九表示宋帝昺曾一度在衙前圍村居住，他說「七百多年前，宋帝昺南逃，到達九龍，首先便是在衙前圍居住，可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宋帝昺怕狗，當時村內的惡狗極多，皇帝不堪其擾，被迫改遷他處。皇帝亦被該村的惡犬嚇走……至今，衙前圍村的『犬隻仍稱『皇驚』」。¹⁰而在2005年的另一次訪問，吳九甚至指稱圍門上的「慶有餘」牌匾，相傳就是宋帝昺所親題。¹¹雖然吳九鄉長從未解釋何以吳氏族譜一

直沒有將這些重要的淵源記載下來，但作爲衙前圍村的發言人，吳九鄉長的言論卻深深地吸引著到來採訪的新聞記者，於是在整個九十年代末至二千年初，本地報紙中有關衙前圍歷史的報導，均牽連到宋帝昺事蹟。

其實吳九鄉長不是第一位將宋帝昺傳說附會到衙前圍村的人，在1974年前鄉長吳渭池也有類似的言論，他說：「爲首到這類『桅棒船』去當海員的，是靠近港口九龍城一帶（衙前圍、沙埔、候【侯】王廟、宋皇台、黃大仙等地區）的勞動人民，這些勞動人民，都是遠在宋朝年庚【間？】隨宋帝南逃下來的隨從的後裔，他們聚居九龍沿海一帶，其中以吳、李、陳三姓爲絕多，他們本來都是以自耕自食的漁民和農民自居，相互團結依靠，還談不上有很大的剝削存在。那時到船上去從事商運工作者，不外是水手，雜務等工作。」¹²換言之，吳渭池認爲衙前圍原居民的吳、陳、李三姓的祖先，就是宋帝昺南下九龍時的隨從。由此看來，吳九鄉長不是首先附會宋帝昺故事，只是他說得更爲完備而已。

夏思義（Patrick Hase）由此深信宋帝昺與衙前圍有著深厚的淵源。¹³在有關衙前圍的研究中，他努力地將口述歷史和族譜之間的分歧作出調和及補足，從而詳細描述衙前圍村的前代歷史。夏思義認爲，吳氏成爲宋帝昺的追隨者最有可能是吳成達的曾祖父吳三樂，三樂居於東莞縣吳家涌，到14世紀中葉，吳成達與父親吳從德才遷進衙前圍村。不過夏思義認爲，在吳氏遷進衙前圍，陳氏應已在那裡定居了二百年。他根據陳氏在1999年編寫的《新界南約坑口區將軍澳村陳勝/秦/學賢族譜移來》指出，陳氏的一世祖名陳俊卿，原籍江西，乃紹興八年（1138）榜眼，拜相尙書左樞射，同年章事兼樞密使，封魏國公，後被派居廣東南雄居住。陳俊卿的兒子夢龍爲二世祖，遷居廣州新安衙邊鄉。到十世祖昌隆，被明政府任爲副總司官，而十一世朝賢則被明政府自新安衙邊鄉調至九龍防守，「是爲九龍之過江祖也，」也是「後派居衙前圍村之始祖也。」而昌隆的另一兒子國賢則分居於衙前壟。¹⁴根據這部族譜，夏思義推論陳氏早在1150-70年左右已居於

衙邊鄉，到1350年左右，吳三樂的曾孫吳成遠也遷入該地。再過二百年，約在1570-74年間，也是到了陳朝賢一代，衙邊鄉的村民（吳、陳、李）在衙邊鄉加建圍牆，衙邊鄉遂成衙前圍。¹⁵筆者認為，對於這一類的鄉村史料，學者必須十分謹慎，尤其是為甚麼陳氏會在1999年編修族譜？並將副本送交衙前圍村村公所（這是研究衙前圍的學者們接觸該族譜的地方）？顯然，這新史料的出現，與衙前圍的發展重建有關——似乎當圍村面臨遷拆的時候，陳氏也欲藉著族譜，表明他們的祖先同樣是歷史悠久的衙前圍原居民。

有關宋帝昺在九龍的傳說，的確一直在古老的九龍地區流傳，而九龍城的宋王臺巨石，也一直被當地人視為宋帝昺曾作駐蹕的證據。羅香林更為此作了非常詳細的考證，指出宋末帝昺在今日九龍及新界大嶼山等地，建立行朝，忠臣義士，從者甚眾。但終於格於時勢，流離瑣尾，未能興復。¹⁶不過近年歷史學者開始對這個事蹟提出疑問，例如鍾寶賢便指出，直至19世紀，有關宋帝昺的事蹟，一直只停留在宋王臺的傳說上，但經過20世紀初清末遺老的「深化」和歷史學者的「考證」，宋帝昺的事蹟變得愈來愈清晰和具體。¹⁷

筆者相信，關於宋帝昺在衙前圍村的事蹟，包括吳、陳、李的祖先乃宋帝昺的大將等等，基本上只限於吳渭池和吳九兩人的理解。首先，除了他們的言論外，這個說法並未有出現過在衙前圍村的其它記錄上。1948年衙前圍村重修天后宮時所造的碑刻曾提及宋帝昺：

我九龍衙前圍天后古廟，歷史邁遠，奇蹟彌多。自宋帝蒙塵，追隨扈從，駐蹕茲土，甘棠遺蔭，莫址斯成，雖兵燹疊經，而棟梁不壞，即風雨剝蝕，而梁仍支。閩鄉生靈，賴其樾蔭者，垂七百餘年矣，迨清雍正間曾加重修……。¹⁸

但是照此碑文的意思，當年追隨扈從宋帝昺來到衙前圍只是天后而已，三姓祖先因為得到天后的護蔭，遂於村內建立天后廟，並於雍正年間

作出重修。

我們在其他村民的訪問內容上，也看不到宋帝昺的淵源。1982年，科大衛教授曾領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在衙前圍村作過深入的實地調查，並訪問了住村內村外約9名年逾50的吳氏村民。¹⁹從這些訪問稿中，雖然有關衙前圍歷史眾說紛紜，例如有一篇訪問強調首先來到衙前圍村定居的是吳氏，指出吳成遠是宋末時候的人，本在大陸捕魚，但不喜歡這種生活，遂留在九龍以種田為生，後來陳姓和李姓的祖先又來，他們先在山邊建屋，後來的發展是三姓聯合建村。²⁰在另一篇的訪問中，被訪者透露衙前圍組成之前，不止於三姓，除了吳、陳、李外，還有車姓和翁姓，「前三姓來得做【早？】，有幾百年歷史，後二姓遲來，不過一百年，且兩姓後裔甚少。」²¹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被訪村民提過圍村與宋帝昺的關係。在本文下筆之際，筆者也向在衙前圍上生上長的吳佛全先生（71歲）請教，吳先生表示在兒時已從長輩中聽聞許多有關宋帝昺在九龍的故事，但從未聽過這個宋朝皇帝與衙前圍有任何關係。

這批1982年的訪問稿中也提到「慶有餘」牌匾的來歷，同樣與宋帝昺無關。據當時的村中父老所說，牌匾位置以前是「炮樓」。²²吳少川（1982年60歲外）則懷疑「慶有餘」三字為紀念打勝「紅頭賊」而寫的。²³吳詠棠先生（1982年約60歲）和吳子芳先生（1982年67歲）認為「紅頭賊」攻打衙前圍村是在清初發生的，當時紅頭賊四處打家劫舍，要村人交出穀物，衙前圍是大村，合力作出抵抗，雙方激戰，最終因村中的銅炮發揮了作用，殺死了二、三百名紅頭賊，衙前圍村亦得以逃過大難。²⁴吳送發先生（1982年68歲）甚至認為衙前圍起圍之初，就是為了防避紅頭賊，圍的四角各建炮樓，上置火炮，而為加強防衛，圍下四週也挖了數十英尺深的水塘等等。²⁵這個說法，與「廟史」碑刻中描述吳、陳、李三族是在清初雍正二年（1724）共同建村開闢而居頗為吻合。

結合以上的證據，所謂宋帝昺在衙前圍的故事，只是兩代鄉長的個人理解而已。不過，宋帝

島的故事被附會到衙前圍村的歷史上，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因素的。

(五) 祖先事蹟與土地發展的關係

我們已不清楚吳渭池在甚麼環境下將宋帝昺的故事附會到衙前圍村的歷史上，但作為鄉長，吳渭池與吳九所面對的問題有一點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在市區重建下衙前圍村的改變。吳渭池在任鄉長期間，香港政府要收回吳氏宗祠的土地，吳渭池為了這個事件，多番與本地官員交涉，甚至上訪廣州向曾生市長和陳郁省長尋求支援。²⁶

吳九鄉長將宋帝昺與衙前圍拉上關係，則正是這條古老圍村面臨全面拆卸危機的時候。1994年，香港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經過詳細勘察後，將衙前圍評估為沒有古蹟特質。這個決定的作出，是因為香港的法例著重單幢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強調物料結構和工藝上的歷史真實性，對於曾經改建但是又有重要社會文化意義的建築物或者建築群，難以在法例上作出保護，而衙前圍村內，大部份房屋卻經過重建，城牆、護城河和吊橋也早已在村中消失，加上許多房屋因為日久失修，面貌已呈頹敗，於是委員會遂對該村落作原址保留並不可行。²⁷ 1996年，香港政府批准專門為政府進行市區重建計劃的公營機構土地發展公司（俗稱「土發公司」）對衙前圍村進行收購和重建。²⁸ 在衙前圍村，超過四成的土地包括村內小巷根本就是公地，所以土發公司只需收購圍內房屋的業權，便可進行重建。但實行起來也並不容易，首先，全圍約有130間房屋，但分散成114個業權²⁹；其次作為公營機構的土發公司在行政上有欠靈活，在土地收購的行動上往往不及私營發展商。若干年後，吳九鄉長對記者有以下的說話：「當年土發派個鬼頭向我傾，我問佢公司有幾多營運資金，佢話總共得二千幾萬作收購經費。咁少，我都費事同佢講。」³⁰ 到1999年，土發公司表示將在地盤上興建住宅樓面積三十七萬四千方呎，提供650個單位，公司更與村民磋商以「業主參與發展」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不過，當土發公司還在政策討論的階段，香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

長江實業集團（簡稱「長實」）屬下的子公司已經陸續收購不少村屋的業權。³¹

以吳九鄉長為代表的衙前圍村村民，對於遷拆的態度有兩個層面：一是爭取最佳的搬遷賠償；二是同時希望政府可以將衙前圍村作為古蹟完整地保存下來。但在以上的形勢下，要同時達到這兩個目標是困難的。站在業主來說，私人發展商的出價必定比較吸引，例如在2002年左右，由「土發公司」改組而成的香港市區重建局（簡稱「市建局」）向原居民提出一項賠償方案，市建局以物業面積計算，每方呎以當時市價賠償。而對市建局的出價，已經在村內取得逾五成的長實立即提高收購價：「一屋換兩樓加三十萬現金方式，限業主在一個月內答覆。」³² 但隨即的問題是，相較於屬於政府公營機構的市建局，村民將更難說服長實將衙前圍村完整保留。事實上，長實也以「購一間「屋」、拆一間「屋」」的行動企圖令村民打消這個念頭。³³ 雖然處於這個形勢下，吳九鄉長仍然希望市建局能向長實和個別業主的房屋全數買下來，再將鄉村重建保存。

吳九鄉長一直致力希望保留整條圍村，筆者自2000年進入衙前圍調查，已發現鄉長不斷地向到訪的學者、學生以及記者解說宋帝昺與衙前圍村的淵源。他所做的，無疑是將衙前圍的歷史與九龍的傳說結合起來，使社會人士相信衙前圍的歷史就是九龍的歷史，而支持保留這個村落。即使到2003年1月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明確重申，政府以圍村大部份屋宇已清拆，難以修復舊貌，決定放棄將圍村列為受保護古蹟，³⁴ 吳九鄉長仍未放棄，他隨即召開「護村大會」，並請來了立法局議員、黃大仙區議員及數名學者到場聲援，向外界講述衙前圍村的歷史和保存這條古老圍村對香港市民的意義。³⁵ 同年他向記者表示衙前圍村村民仍稱犬隻為「皇驚」，乃因當年宋帝昺住在衙前圍村時，曾被犬隻驚嚇云云。³⁶

保存衙前圍的氣氛是在2004年開始改變。3月，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立法局重申衙前圍村因為經過近代大規模的改建，不符合法例保護的範圍；而到8月，長實集團已增持圍村村屋業權達百分之六十八。³⁷ 不過最大的轉變是，連吳九

鄉長也於這年將祖屋賣予長實，這使他難以再代表餘下的原居民業主在市建局和長實進行磋商或談判。2005年10月3日，衙前圍村原居民業主、業主、居民、商戶共同發信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暨全體區議員，副本並送市區重建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民政事務局、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黃大仙民政事務處，信件指出：「現在有些反對重建衙前圍村的人士或議員，他們都是沒有業權在本村或非住在本村的居民，重建或保留與他們沒有直接生活上的影響。」【我們原居民業主、居民業主、居民、商戶，不同意整條衙前圍村列作古蹟文物保留】，我們與市區重建局經開會商討後接受重建加保留方案，把村內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保留，重建後可命名為衙前圍村中心或廣場（須經各方認可），這樣照顧到居民、業主及市區重建局各方的意見。」³⁸ 文中所謂的村內有歷史價值的文物指天后廟、門樓及「慶有餘」牌匾。這個新保留方案，顯然較吳九鄉長一直所要求的小規模得多。但作為鄉長，吳九仍然作出配合，所謂宋帝昺親題「慶有餘」牌匾，便是他在10月底告訴記者的。³⁹

衙前圍村現時可能已不再需要宋帝昺了。2005年11月，應衙前圍原居民業主、居民業主、居民和商戶的要求，黃大仙區議會通過，支持衙前圍村納入市建局重建項目，市建局亦表明，會立刻啟動重建程序，盡量配合村民的意願，同時承諾會保留村內的三件古蹟。⁴⁰ 而一個月後（12月26日），吳九鄉長也與世長辭。不過，在過去十多年間，經過報紙傳媒的輾轉廣泛報導，衙前圍村的三姓祖先，以及它的「慶有餘」牌匾，也有可能成為宋帝昺在九龍事蹟中的佐證。

(六) 結論：浮動的祖先記憶

天后宮內「廟史」碑刻所說雍正二年（1724）吳、陳、李三族姓氏建村開井而居，極有可能是衙前圍正式建立起來的時間。當然，這並不表示在這之前該地沒有村落。事實上杜臻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行《粵閩巡視紀略》一書，其卷二提及「衙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行的《新安縣志》中，在今日九龍地

區也註有衙前村。⁴¹ 顯然在1724年建圍之前，該地已出現衙前村。不過，這衙前村的居民是否就是吳、陳、李三姓？或是否只得該三姓？就不得而知了。

吳、陳、李三姓在雍正二年合力建成衙前圍，顯然為了防禦海盜。沿海治安不靖，是清初的遷海政策造成的。清朝立國之初，為打擊鄭成功在台灣的反清勢力，於康熙元年（1662）命令東南沿海邊界內遷50里。幸好康熙八年（1669），清廷批准廣東省復界，北徙7年的九龍居民也可回鄉了。⁴² 不過，朝廷雖復界，但對許多離鄉的居民來說，回鄉居住仍然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原因是，當年遷海措施所針對的台灣鄭氏，在1684年投降前還非常活躍，因而由這股反清力量而起的海盜問題，在廣東復界後仍一直騷擾村民的生活。正因這個緣故，九龍彭埔圍在1676年因遭到海盜攻陷，結果圍內村民無一生還。在當時世局混亂之下，九龍竹園村林氏依仗著同是林姓的大鵬營管隊的保護首先在九龍定居下來，他們族人甚至很快分支至附近的蒲崗村，擴大生活範圍和耕種地。⁴³ 九龍的治安一直是地方問題，即是在1684年後，海盜的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所以吳、陳、李三姓需要遲至1724年，在居住地加建了圍牆，才能真正地安居下來，而衙前圍村民也從此流傳建圍以抗紅頭賊的故事。

宗族與定居是兩回事，宗族是以追溯同一祖先的過程，達到聯盟和排他的目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19世紀初的嘉慶初年，一些居住在衙前圍及其週圍地區的吳姓村民，已透過修墳，嘗試建立一個以日玄祖為祭祀中心的宗族結構。但吳氏宗族的擴大則在光緒二十年（1894），當時日玄祖子孫，成功地與當地其他吳氏結成更緊密的聯系，在這前題下，以九龍始祖吳成達為祭祀中心的吳氏宗祠隨即建立起來，下分廣玄、東玄、泰玄和日玄四房，共成衙前圍吳氏一族。

宗族組織既已確立，吳成達是甚麼時代的人反而成為次要的問題，而且時代模糊，更可能令故事有發展的空間。在早期的敘述中，吳成達有被說成是明初的人，但當近年圍村面臨遷拆的危

機，他又成了追隨宋帝昺南下九龍的大將。浮動的祖先記憶，正正就是明清以來華南宗族的結構特色。

註釋：

- ¹ 《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1986)，頁7-8。
- ² 明清的法律規定，除了貴族和品官之家，庶民不得建祠祭祖。
- ³ 據衙前圍村民吳送發先生(1982年68歲)在1982年的記述，「吳家子孫分兩種，一稱延陵，由大婆所生；一稱渤海，由細婆所出。」【吳氏】宗祠所掛的皆是延陵，沒有渤海的。(參考〈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日，訪問人：李宜芬、麥瑞珍；整理：李宜芬。)若果那是指衙前圍村內的情況，那意味那時當地還住著另一群來自不同祖先的吳氏。
- ⁴ 族譜中的其它有關吳居厚的部份也出現嚴重的矛盾，包括指出他是宋嘉佑進士。考嘉佑是宋仁宗1056-1063的年號，這時吳居厚還沒出生。
- ⁵ 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出版：2003)，頁190。
- ⁶ 李富，〈關於九龍城衙前圍立村之事蹟〉，收入《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香港：九龍十三鄉委員會出版：1982)，頁17。
- ⁷ 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頁190。所謂「七約」，是指七條鄉村組成的互保組織。這七條鄉村，包括衙前圍村、沙埔村、大磡村、隔坑村、打鼓嶺村、石鼓壟村和衙前墾村。
- ⁸ 有關這個問題，可參考劉志偉，〈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教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151。
- ⁹ 《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1986年，頁35。
- ¹⁰ 《新報》：2003年9月16日。
- ¹¹ 《星島日報》：2005年10月24日。
- ¹² 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1974年。
- ¹³ 夏思義指出，衙前圍村的父老曾對許舒(James Hayes，60年代曾到衙前圍村作實地調查)和他

(約在90年初開始在衙前圍作調查)講述吳、陳、李三姓祖先與南宋朝廷的關係。(參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9 (2002), p. 62 [footnote 13]。)但夏思義沒有說明，在許舒和他本人前後兩次的訪問中，告知他們宋帝昺故事的是否就是吳渭池和吳九兩位鄉長？

- ¹⁴ 《新界南約坑口區將軍澳村陳勝/泰/學賢族譜移來》：1999年。
- ¹⁵ 參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pp. 1-15。夏思義認為衙前圍最初建圍的時間應該是在1570-74年間，他考慮到新界大圍是在1574年建圍，而大圍的父老告訴他大圍建圍的風水師是從衙前圍建圍後請過去，故得出如此的結論。見上文頁9。高添強對衙前圍歷史的見解與夏思義相近，參考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頁45-93。
- ¹⁶ 羅香林對此有詳細的考證，參考羅香林，〈宋王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收入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67-108。
- ¹⁷ 鍾寶賢，〈緒論：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1-29。
- ¹⁸ 「重修天后碑記」(1948年)，衙前圍天后宮內，見於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頁177。
- ¹⁹ 筆者特此感激科大衛教授借出訪問稿參考。
〈衙前圍村吳健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1日)，訪問人：麥瑞珍、李宜芬；整理：李宜芬。
- ²⁰ 〈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日)，訪問人：李宜芬、麥瑞珍；整理：李宜芬。
- ²¹ 〈衙前圍村父老〉訪問稿(1982年5月15日)，訪問人：科大衛、麥瑞珍、李宜芬、黃永豪；整理：麥瑞珍。
- ²² 〈衙前圍村吳兆川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5日)，訪問人：麥瑞珍、李宜芬；整理：李宜

- 芬。
- 23 〈衙前圍村吳兆川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10日)，訪問人：科大衛；整理：麥瑞珍。
- 24 〈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日)，訪問人：李宜芬、麥瑞珍；整理：李宜芬。
- 25 參考本專號的〈胡渭池傳略〉。
- 26 《明報》1999年8月4日；《立法會：「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動議辯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發出(2004年3月24日)。
- 27 《明報》：1999年8月4日。
- 28 《信報財經新聞》：2004年8月3日。
- 29 《壹週刊》：2003年1月23日。
- 30 《明報》：1999年8月6日。
- 31 《星島日報》：2002年3月19日。
- 32 《香港經濟日報》：2006年2月10日。
- 33 《東方日報》：2003年1月18日。
- 34 《太陽報》：2003年1月26日，筆者也有出席。
- 35 《新報》：2003年9月16日。
- 36 《立法會：「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動議辯論》2004年3月24日；《信報財經新聞》2004年8月3日。
- 37 《衙前圍村原居民業主、業主、居民、商戶要求市區重建局盡快開展衙前圍村重建計劃》2005年10月3日。
- 38 《星島日報》2002年10月24日。
- 39 《香港經濟日報》2005年11月9日。
- 40 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頁16。
- 41 同上，頁16。
- 42 張瑞威，《宗族的聯合與分歧：竹園蒲崗林氏編修族譜原因探微》，《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28期(2002年7月)，頁1-8。

圖一、1961年衙前圍位置圖



華僑日報編：1962年《香港年鑒》所載之黃大仙地區圖。轉引自游子安等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2003)，頁22。